

王韶生著

懷冰室文學論集

李璜題



宋傑上初自碧五
元承配唐書淵嶺黃
律陳子張以含韶以
詩隋昂九降珠南間
之之論齒著雅人原先
體風者謂有復物壯之
而不所初曲史亦麗詩
免能唐江代磊紅學
輕潤之集來落棉緒
靡詩其詩英挺論
追沈四詩人多秀

王韶生著

懷冰室文學論集

李璜題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中華民國七十年四月初版

懷冰室文學論集

定價：港幣叁拾圓整

作者：豐順 王韶生

發行者：志文出版社

新界上水郵政信箱九十三號
電話：NT—九〇一一八〇

承印者：致達公司

香港德輔道中三〇六號六樓
電話：HK—四三七三五
四三七一二四

自序

庚申初秋。及門諸子。倡議爲印學術論著。適瑣務減少。有餘暇整理舊稿。爰將文學論集。先付手民行世。回溯少日。負笈南北兩大學。禮事碩德耆儒。捧手受教。師門玄言高論。特識鴻裁。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若莫爲之後。則雖盛而不傳。余滋懼焉。旋以國計身謀。旋食四方。不暇寧處。抗戰期中。游擊於西樵山區。尤爲蹈危履險。一心報國。遑恤其他。誠有如藏雲室主詩所云。夙昔都無著書意。惟將身手獻邦人。此一時也。

居港而後。環境稍佳。還讀我書。講授於庠序間。作爲文章。登載於廣僑崇基珠海三學報。及華國雜誌者。篇數迭增。然置諸行篋。不敢輕以示人。茲應諸子之請。不復捐棄。冀爲傳布。其於舊學商量。新知培養。倘有一助乎。

集貲助印者。爲珠海文史研究所畢業同學。中文大學崇基學院中文系舊生。廣東省立勤勤大學。文理學院留港諸師友。編校經紀其事者。爲何生文華。李生志文。馬生桂綿。董生金等。勛助良多。合誌謝忱。憶昔休寧戴君有言。爲學有三難。淹博難。精審難。識斷難。知其所難。而不忽其爲易。余曷敢蘄至於世之立言者耶。尙希賢人君子。進而教之。是爲序。

中華民國七十年元日王韶生序於香港珠海文史研究所。

目錄

自序

文心雕龍對於中國文論的影響	一一二
唐代散文	一三一
韓柳文之比較	二二一
姚鼐文學批評論述評	二九一
高閔仙先生與古典文學	三四一
王國維文學批評著述疏論	五八一
論王靜安之文學	七八一
讀陶詩札記	八六一
唐宋詩體述略	九三一
論寒山詩	一〇七一
王維詩研究	一一八一
論杜甫詠物詩	一三四一

元遺山論詩三十首箋釋	一四〇—一六五
宋芷灣先生詩之研究	一六六—一八九
丘倉海（逢甲）先生詩之研究	一九〇—二一三
黃晦聞先生之詩學	二一四—二三二
宋詞流變論	二三三—二四七
論桐花閣詞	二四八—二五四
朱彊村望江南詞箋釋	二五五—二八〇
彊村論詞	二八一—二八七
紀香港兩大詞人	二八八—三〇三
廣東詞人與香港之因緣	三〇四—三二五
評水原子瑞「琴窗詞稿」	三二六—三三二
中國詩詞在香港之發展	三三三—三四一
中世紀的歐洲文學思潮	三四三—三五七
跋（一）	三五八—三五九
跋（二）	三六〇—三六一

文心雕龍對於中國文論的影響

諸論

文心雕龍，是文學批評一部重要的書，可說是江河不廢，光景常新。近人王利器校箋的文心雕龍新書中，附錄二序跋類，輯錄了元、明、清的學人評論文心的文章二十三篇，附錄三雜纂類，輯錄了唐宋以下的學人評論文心的文字三十八則，楊明照文心雕龍校注中附錄二品評類，亦輯錄了沈約、劉子玄、空海、黃庭堅以下共五十二家評論文字，可說是洪纖畢錄，洋洋大觀。伯克萊大學教授陳子龍（世驤）曾說道：「劉勰的文心雕龍和亞里斯多德的詩論，同是世界文學批評巨著。」（見與李卓敏校長書，鄧仕樑譯。）這一句說話，評價很高，而且扼要，遠出前人之上。

文心成書，一方面彌綸羣言，深極骨髓；一方面機杼獨運，時有勝解。序志篇曾說明他寫作宗旨：「及其品列成文，有同乎舊談者，非雷同也，勢自不可異也。有異乎前論者，非苟異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與異，不屑今古，擘肌分理，唯務折衷。」由前之說，是「博極而服」；由後之說，是「有關必先」。

關於劉勰採納前人的論文見解，黃季剛先生曾評論過：「文心多襲前人之論，而不嫌其鈔襲，未若世之君子必以己言爲貴也。即如頌贊篇大意本之文章流別，哀弔篇亦有取於摯君，信乎通人之識，自有殊於流俗已。」（中華版文心雕龍札記二式二頁。）饒君宗頤撰文心雕龍探原一文（

見港大中文學會出版文心雕龍研究專號。」對於文心各體分類之依據，和各篇之取材，劉勰與宗炳、顏延之和沈約之關係，文心一書對南北朝文學界之影響三項，均有詳盡的敘述。現在我談的文心影響則斷自唐宋以後。

（一）關於原理方面

文心以原道、徵聖、宗經、正緯、辨騷五篇爲文之樞紐，尤以前三篇對於唐宋以後之古文家影響極大，序志篇說：「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因此推原道樞，以立文學的本體。其實劉勰所說的道，廣泛的解釋便是自然之道，近人劉永濟說：「舍人論文，首崇自然；所謂自然者，即道之異名。道無不被，大而天地山川，小而禽魚草木，精而人紀物序，粗而花落鳥啼，皆自然之文也。文學封域，此爲最大。」（文心雕龍校釋卷上頁二中華版）

在韓非子解老篇裏亦說及：「道者，萬物之所然也，萬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萬物之所以成也。……聖人得之以成文章。」（東人太田方韓非子翼毳注：「文章，謂禮樂刑政也。」引見陳啓天韓非子校釋中華叢書本）

文心范注則引周禮「儒以道得民」一說，斷爲「彥和所稱之道，自指聖賢之大道而言，故篇後承以徵聖，宗經兩篇，宗旨甚明。」支持此一說的，如黃繼持撰的「文心雕龍與儒家思想」，（文心雕龍研究專號二十一——二十七）楊明照撰的「從文心雕龍、原道、序志篇看劉勰的思想」，（文心雕龍研究專集頁一——頁二十七），都舉出許多例子，加以証明。本來，在原道篇提到的

天地之文，就是自然之文，是廣義的。人元之文，就是聖賢之文，是狹義的。只是範圍有廣狹之分，原道，載道，同出一源，決不可執此非彼。紀昀說得好：「文以載道，明其當然；文原於道，明其本然。」這是「截斷眾流」的說話。

宋代的理學家只許可韓愈是因文見道，他曾經自述爲學的過程說「性本好文學，因困阨悲愁無所告語，遂得究窮於經傳史記百家之說，沈潛乎訓義，反復乎句讀，覃磨乎事業，而奮發乎文章。凡自唐虞已來，簡編所存，大之爲河海，高之爲山嶽，明之爲日月，幽之爲鬼神，織之爲珠璣華實，變之爲雷霆風雨，奇辭奧旨，靡不通達。」（上兵部李侍郎書，韓昌黎集校注八三頁）在韓愈集子裏有許多篇論文書，我獨舉出這篇，筆調和內容和劉勰的原道篇却有點相似，大可玩味。

柳宗元答韋中立論師道書，曾提到「文者以明道也」，「每爲文章……，所以羽翼乎道也。」而着重於宗經，他說：「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體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河東先生集卷五頁五）這一種說法和劉勰大致上相同，這便是「理不可易」。

劉勰說：「道沿聖以垂文，聖因文以明道。」又說玄聖創典，素王述訓，莫不原道心以敷章。清代曾國藩則以見道的多寡，以定文的醇駁。他說：「大抵孔子之苗裔，其文之醇駁，一視乎見道之多寡以爲差。見道尤多者，文尤醇焉；孟軻是也。次多者，醇次焉；見少者，文駁焉；尤少者，尤駁焉；自荀、揚、莊、列、屈、賈而下，次第等差，略可指數。」（與劉孟蓉書世界書局版曾文正公全集五二頁）則仍是推衍劉氏之說。

大抵前人認爲明道之文，即聖賢之文，而「聖賢之道充乎中。」（見宋濂文說）「得諸心，克諸身，擴而被之天下。」（見曾鞏答李觀書）文如離開了道，便不成其爲文。但後來也許因爲道字，似乎說得過於抽象，不易爲人所懂，於是另一些論文家便將道字轉到理字的方面。除了道字外，更添入一理字。因此將把明道之文，改稱爲說理之文。如張文潛教人作文，便是以理爲主。嘗著論說：「自六經以下，至於諸子百氏、騷人辯士論述，大抵皆將以爲萬理之具也。故學文之端，急於明理。如知文而不務理，求文之工，世未嘗有也。」（見百衲本宋史卷四百四十四文苑六張耒傳，和張右史集答李推官書）章實齋亦說：「夫言所以明理，而文辭則所以載之之器也。」又說「文固所以載理，文不備，則理不明也。」（文史通義內篇三辨似）由道說到理，似乎更明確一點。

（二）關於創作方面

劉勰論文，首重「神理」，又專立「神思」、「養氣」兩篇，認爲這是創作的主要條件。神思篇說到「思理爲妙，神與物遊，神居胸臆，而志氣統其關鍵。……關鍵將塞，則神有遯心。」以爲心思出於神，神即作文之基本原動力。故此，一則說：「吟詠之間，吐納珠玉之聲；眉睫之前，卷舒風雲之色，其思致之謂乎？」再則說：「夫神思方運，萬塗競萌。……登山則情滿於山，觀海則意溢於海，我才之多少，將與風雲而無驅矣。」案易繫說：『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又說：「精義入神。」「神」這一項，必要等到功候足，與會到，然後可以辦到。像庖丁之解牛，

神乎其技。（見莊子養生主）像個僂丈人之承蜩，何爲不得。（見莊子達生篇）大詩人杜甫便懂得這種道理，像蘇端、薛復筵簡薛華醉歌說：「文章有神交有道」，李潮八分小篆歎說：「書貴瘦硬方通神」，上韋左丞二十韻說：「下筆如有神」，故此，他的詩常常有神來之筆。

又其次養氣篇說到「率志委和，則理融而情暢」，這是說率循志氣，委任和順，則可以辦到氣充而辭達。換句話說，便是「氣，文之充也。」養氣之說，始於孟子，而王充論衡自紀篇亦曾提到。在我看來，劉勰的說法：「鑽礪過分，則神疲而氣衰。」似乎帶有點消極性。像韓愈答李翊書說：「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長短，與聲之高下皆宜。」像蘇軾答王定國詩說：「昌詩如膏面，爲人作容姿，不如昌其氣，鬱鬱老不衰。雖云老不衰，劫壞安所之。不如昌其志，志壹氣自隨。養之塞天地，孟軻不吾欺。」一文一詩，更來得積極。

不過劉勰在神思篇裏說及「陶鈞文思，貴於虛靜」，在養氣篇中，則說及「清和其心，調暢其氣」，治心、養氣，當然是文術的重要一環了。

此外神思篇中又說到：「積學以儲寶，酌理以富才，研閱以窮照，馴致以懌辭」，這四項亦是創作的先決條件。總術篇，則申論文術的重要，一切方法論均由此出。近人黃海章撰的劉勰的創作論和批評論，（見中山大學學報一九五九年第一期，現收入文心雕龍研究集內。）曾有詳盡的說明，茲不再贅述了。

(三) 關於批評方面

文心雕龍五十篇當中，純粹屬於文學批評的，有指瑕，才略，程器，知音四篇；指瑕批評作品，才略，程器批評作家，知音則闡明批評原理。說到怎樣去屏除主觀的偏見，而建立客觀的文學批評標準，就是要先除去三蔽，而建立六觀，這一點近人討論的不少，只好略去。現在討論他對一些作家和作品的見解。

拿曹丕、曹植兄弟來說，劉勰對他們的批評，很是公道，沒有崇甲抑乙，像詩序篇說：「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辭賦；陳思以公子之豪，下筆琳琅，並體貌英逸。」在才略篇又說：「魏文之才，洋洋清綺，舊談抑之，謂去植千里。然子建思捷而才文，詩麗而表逸。子桓慮詳而力緩，故不競於先鳴；而樂府清越，典論辯要，迭用短長，亦無憎焉。但俗情抑揚，雷同一聲，遂令文帝以位尊減才，思王以勢窘益價，未爲篤論也。」所下的斷語，很有分寸，表示出一種真知灼見。但是後來王夫之撰的薑齋詩話，批評曹氏兄弟二人，却不免帶有主觀的成分：薑齋詩話卷第二十九則有如下的記載：「文字門庭，自建安始。曹子建鋪排整飾，立階級以賺人升堂；用此致諸趨赴之客，容易成名，伸紙揮毫，雷同一律。子桓精思逸韻，以絕人扳躋，故人不樂從，反爲所掩。子建以是壓倒阿兄，奪其名譽。實則子桓天子駿發，豈子建所能壓倒耶？」又詩話第三一則說：「曹子建之於子桓，有仙凡之隔；而人稱子建，不知有子桓，俗論大抵如此。」（薑齋詩話一九六—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以上兩項批評，那一項是主觀？那一項是客觀？心水清的人，自然是明白了。林紓對這一問題，亦曾表示一點意見，他說：「子恒才不逮其弟，然能探文字之本原，建議亦復不磨。子建驚才絕艷，文字復能發露其性情。」（商務版林紓評選譙東父子集序）這一見解，略同於劉而異於王，果真「知多偏好，人莫圓該」麼？

劉勰批評屈原的作品，採純文藝觀點，說是「取鎔經意，自鑄偉辭」。並且逐篇批評說：「騷經、九章，朗麗以哀志，九歌、九辯，綺靡以傷情；遠遊、天問，瓌詭而惠巧；招魂、招隱（一作大招），耀艷而深華；卜居標放言之致，漁父寄獨往之才。故能氣往轢古，辭來切今，驚采絕艷，難與並能矣。」這裏所指出的朗麗、綺靡、瓌詭、耀艷，純從文章表現的體貌上着想，從文字的深華立論；同時指出屈賦對於後來的影響，是忠實的盡了文學批評的任務。可是南宋的朱熹對於屈原作品的批評却不是這般，而是從道德的觀點出發。

朱熹的楚辭集註序說：「原之爲書，其辭旨雖或流於跌宕、怪神、怨懟、激發，而不可以爲訓；然旨生於繾綣，惻怛不能自己之至意，雖其不知學於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而獨馳騁於雙風變雅之末流，以故醇儒莊士或羞稱之。然使世之放臣、屏子、怨妻、去婦，投淚謳吟於下，而所天者幸而聽之。則於彼此之間，天性民彝之善，豈不足以交有所發；而增夫三綱五典之重，此予之所以每有味於其言，而不敢直以詞人之賦視之也。」（上海掃葉山房楚辭集註）

在這裏，朱熹說「不敢以詞人之賦視之」，那麼，當然屈原的作品，是詩人之賦了。揚雄法言說：「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麗則」二字，屈賦當之是無愧色的。

說到文學批評的法則，是多方面的，劉勰的指瑕篇，是屬於指摘的批評。他認為「古來文才」，「鮮無瑕病」，所以曹植、左思、潘岳、崔瑗、向秀的作品，都有瑕疵可摘，有的是措詞不當，有的是用事不妥，有的是比擬失實。在夸飾篇裡亦指出班固的東都、張衡的西京、子雲和平子的羽獵，有些地方，虛用濫形，和事義睽刺。

清代紀昀是一位批評家，他對於文心、史通、蘇東坡詩、和瀛奎律髓所收的近體詩，都有批評。特別是對於瀛奎律髓所收的作品，鑑賞的批評少，而指摘的批評多。他是有博觀的學人，却未能應用六觀的方法，循「按文以人情」的道路，有時流於苛刻，可知文學批評一事，是不易做的工作。

至對作家的批評，程器篇中，對於一班的指摘，曾加以辯護，第一古代文武大員，疵咎實多。第二文人並不全是無行，為什麼專門指摘司馬相如、揚雄、馮衍、杜篤以次這一班人。更希望文士「貴器用而兼文采」，「窮則獨善以垂文，達則奉時以騁績」，這真是平恕之詞。像裴行儉批評初唐四傑說：「士之致遠，先器識而後文藝。勃等新有文才，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之器耶？楊子沈靜，應至令長，餘得令終為幸。」（唐書卷一百九十頁上王勃傳）這番說話，除了首兩句還有些道理外，其他在語意學上犯了毛病。王勃孝於親，駱賓王忠於唐，盧照隣亦狷介之士，把浮躁淺露一句話去抹殺他們，怎叫人服輸，行儉所說，算是不幸而言中。

（四）關於體貌方面

文心體性篇說：「才有庸雋，氣有剛柔，學有深淺，習有雅鄭。」才氣是屬於先天的，學習是後天的，由於情性所鑠，陶染所凝，因此使到「筆區」「文苑」，雲譎波詭，產生種種不同的體貌了。

體貌，是作家的個性和人格在文學內涵和外形一個綜合的表現。文心時序篇談到曹公父子的文學，稱他們「並體貌英逸」。詮賦篇，則談到「靈均首倡，始廣聲貌」。案范曄後漢書文苑傳贊，說：「情志既動，篇辭爲貴。抽心呈『貌』，非雕非蔚。殊狀共『體』，同聲異氣。」體貌二字，大概是從這裏而來。陸機文賦說：「文微以溢目，音冷冷而盈耳。」溢目的是形，屬於視覺。盈耳的是聲，屬於聽覺。大概是聲貌所本。

體性篇所立的八體：一典雅，二遠奧，三精約，四顯附，五繁縟，六壯麗，七新奇，八輕靡。這八體，可以歸納爲四類；即雅與奇爲一組，奧與顯爲一組，繁與約爲一組，壯與輕爲一組。雅與奇指體式說，即本篇所稱體式雅鄭，鮮有反其習。奧與顯指事義說，即本篇所稱事義深淺，未聞乖其學。繁與約，指辭理說，即辭理庸雋，豈能翻其才。壯與輕指風趣說，即風趣剛柔，寧或改其氣。

劉勰在本篇說：「數窮八體」，又說：「八體屢遷」。考定勢篇中列舉出六類文章，與八體比較，僅典雅仍舊，此外清麗、明斷、竅要、宏深、巧麗，稍有不同。後來日本文鏡秘府論卷四論體篇有博雅、清典、綺艷、宏壯、要約、切至六目，是本之文心所舉八體，稍加改易，而除去新奇、輕靡兩體的。

曾國藩說：「凡大家名家之作，必有一種面貌，一種神態，與他人迥然不相同。譬之書家，義、獻、歐、虞、褚、李、顏、柳，一點一畫，其面貌既截然不同，其神氣亦全無似處。……詩文亦然，若非其貌其神，迥絕羣倫，不足以當大家之目。……讀古文古詩，惟當先認其貌，後觀其神，久之自能分別蹊徑。」（曾文正公全集家訓類）

案劉勰的體性篇，曾詳細分析賈生、長卿、子雲、子政、孟堅、平子、仲宣、公幹、嗣宗、叔夜、安仁、士衡十二人的文章風貌。曾氏雖然治古文，但他並不反對讀漢魏晉宋齊梁人的文章，所以他教訓他的兒子紀澤說：「當專心一志，以精確之訓話，作古茂之文章。由班張左郭，上而揚馬，而莊騷，而六經，無不息息相通。下而潘陸，而任沈，而江鮑，而徐庾，則詞愈雜，氣愈薄，而訓詁之道淺矣。」（見家訓），這一見解，要比韓愈高明。

以下且談唐以後的文家，對於體貌的見解。

司空圖著詩品一卷，凡分二十四品：曰雄渾，曰沖淡，曰纖穠，曰沈著，曰高古，曰典雅，曰洗鍊，曰勁健，曰綺麗，曰自然，曰含蓄，曰豪放，曰精神，曰縝密，曰疏野，曰清奇，曰委曲，曰實境，曰悲慨，曰形容，曰超詣，曰飄逸，曰曠達，曰流動，各以韻語十二句體貌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此二十四品，較之體性篇八體，更爲詳盡，提要說是書深解詩理，而譏評王士禛但取其「采采流水，蓬蓬遠春」二語，又取其「不著一字，盡得風流」二語，以爲詩家極則，其實並非篤論。

桐城派巨子之一劉大櫟論文分列：貴奇、貴高、貴大、貴遠、貴簡、貴疏、貴變、貴瘦、貴華，

是爲九貴。（見論文偶記商務書館出版頁六——頁十）

至姚鼐則創爲古文陰陽剛柔之說，除見於答魯絮非書外，他如海愚詩鈔序，亦說：「文章之原，本乎天地；天地之道，陰陽剛柔而已。苟得乎陰陽剛柔之精，皆可以爲文章之美。」（姚姬傳先生集世界書局排印本）曾國藩更推衍其說，得於陽與剛之美者，此天地之義氣。得於陰與柔之美者，此天地之仁氣。（見聖哲畫象記）又析爲古文四象之說，分文爲太陽、少陽、太陰、少陰四類；並有四象古文選本（吳汝綸與賀松坡書中華版吳肇甫尺牘）。大抵陽剛重在氣勢噴薄，陰柔重在韻味深美。

章學誠著質性篇，說：「前人尚論，情文相生，由是論家喜論文情。不知文性實爲元宰，離性言情，珠亡檀在。」因此依照洪範篇以正直、剛克、柔克三德爲標準；並且說：「人秉中和之氣以生，則爲聰明睿智；毗陰毗陽，是宜剛克柔克。」可以補前人的缺義。

末了，再引用曾國藩之說，以結束本章。曾氏說：「古文境之美者，約有八言。陽剛之美，曰雄、直、怪、麗。陰柔之美，曰姑、遠、潔、適。」各作十六字贊之。（見求闕齋讀書記上海掃葉山房石印本）。這一說亦可以和體性八體比較參看。

結 論

以上雜引唐宋以迄晚清各家文論及專書，和劉勰所著文心各篇，互相發明，希望增進我們研究的範圍，擴大我們的視野。這並不是說後人之學，不及前人；亦不是說後人之學，遠勝前人。